

王美凤 张波 刘宗镐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关学学术编年

学术研究系列

关学文库

总主编 刘学智 方光华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关学文库 总主编 刘学智 方光华

学术研究系列

关学学术编年

王美凤 张 波 刘宗镐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学学术编年/王美凤,张波,刘宗镐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4. 10

(关学文库/刘学智,方光华主编)

ISBN 978-7-5604-3515-2

I. ①关… II. ①王…②张…③刘… III. ①关学—
思想史 IV. ①B2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1841 号

出品人 徐晔 马平

篆刻 路毓贤

出版统筹 张波 何惠景



关学学术编年 王美凤 张波 著

责任编辑 马平 装帧设计 泽海

版式统筹 刘争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E-mail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35

字 数 55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515-2

定 价 72.00 元

《关学文库》组织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赵正永

副 主 任 江泽林 王莉霞 张岂之 陈国强 张祖培

执行副主任 徐 晔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上官吉庆 马 来 王 勇 王莉霞

王景安 方光华 权 俭 刘学智 江泽林

李 浩 李明远 张小宁 张岂之 张社年

张祖培 陆柯仑 陈国强 岳 亮 赵正永

赵馥洁 姜 锋 桂维民 徐 晔 郭大为

郭立宏 阎晓宏 彭树智 董 军 薛保勤

《关学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岂之

副 主 任 赵馥洁 薛保勤

执行副主任 徐 晔 马 来

总 主 编 刘学智 方光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来 王美凤 方光华 米文科 许 宁

孙学功 刘学智 杨建辉 李似珍 李颖科

何惠昂 张 波 张 萍 张 雄 张世民

张岂之 陈战峰 林乐昌 赵瑞民 赵馥洁

郝润华 袁志伟 徐 晔 高彦平 郭文镐

曹树明 韩 星 路毓贤 薛保勤 魏 冬

总序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宋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人,祖籍大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张载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张复在宋真宗时官至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死后赠司空。父亲张迪在宋仁宗时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张迪死后,张载与全家遂侨居于凤翔府郿县横渠镇之南。因他曾在此聚徒讲学,世称“横渠先生”。他的学术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横渠之学”,他所代表的学派被后人称为“关学”。张载与程颢、程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可以说,关学是由张载创立并于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的地域性理学学派,亦称关中理学。

关学基本文献整理与相关研究不仅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也是体现中国思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举措。《关学文库》以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为宗旨,以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开拓性为特点,是我国第一部对上起于北宋、下迄于清末民初,绵延八百余年的关中理学的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大型丛书。这项重点文化工程的完成,对于完整呈现关学的历史面貌、发展脉络和鲜明特色,彰显关学精神,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关学文库》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仅就关学、关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关学的思想特质、《关学文库》的整体构成等谈几点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一、作为理学重要构成部分的关学

众所周知,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形态与新阶段,一般被称为新儒学。但在新儒学中,构成较为复杂。比较典型的则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南宋学者吕本中较早提到“关学”这一概念。南宋朱熹、吕祖谦编选的《近思录》较早地梳理了北宋理学发展的统绪,关学是作为理学的重要一支来

作介绍的。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祚等人纂修《元史》,将宋代理学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大派别,其中虽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但它们的内涵及其影响并不限于某个地域,而成为中华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即宋代理学。

根据洛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以及闽学代表人物朱熹对记载关学思想的理解、评价和吸收,张载创始的关学本质上当是理学,而且是影响全国的思想文化学派。过去,我们在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宋明理学史》上册的时候,在关学学术旨归和历史作用上曾作过探讨,但是也不能不顾及古代学术史考镜源流的基本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张载后学,如蓝田吕氏等,在张载去世后多归二程门下,如果拘泥门户之见,似乎张载关学发展有所中断,但学术思想的传承往往较学者的理解和判断复杂得多。关学,如同其他学术形态一样,也是一个源远流长、不断推陈出新的形态。关学没有中断过,它不断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融合。明清时期,关学的学术基本是朱子学、阳明学的传入及与张载关学的融会过程。因此,由宋至清的关学,实际是中国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动态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概念,它开启了清初王船山学术的先河。

《关学文库》所遴选的作品与人物,结合学术史已有研究成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关学编》及《关学续编》《关学宗传》等,均是关中理学的典型代表,上起北宋张载,下至晚清的刘光蕡、民国时期的牛兆濂,能够反映关中理学的发展源流及其学术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与历史上的《关中丛书》相比,这套文库更加丰富醇纯,是对前贤整理文献思想与实践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二、张载关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

佛教传入中土后,有所谓“三教合一”说,主张儒、道、释融合渗透,或称三教“会通”。唐朝初期可以看到三教并举的文化现象。当历史演进到北宋时期,由于书院建立,学术思想有了更多自由交流的场所,从而促进了学人的独立思考,使他们对儒家经学笺注主义提出了怀疑,呼唤新思想的出现,于是理学应时而生。理学主体是儒学,兼采佛、道思想,研究如何将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理学产生时起,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学学派。

比如,在“三教融合”过程中,如何理解“气”与“理”(理的问题是回避不开的,华严宗的“事理说”早在唐代就有很大影响)的关系?理学如何捍卫儒学早期关于人性善恶的基本观点,又不致只在“善”与“恶”的对立中打圈子?如何理解宇宙?宇宙与社会及个人有何关系?君子、士大夫怎么做才能维护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又能坚持修齐治平的准则?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中宇宙观与人生观的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需要在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宋代理学的产生及不同学派的存在,就是上述思想文化发展历史的写照,因而理学在实质上是中國思想文化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南宋时朱熹闽学各有自己的特色。作为理学的创建者之一,张载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抱负,在对儒学学说进行传承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北宋时期,学者们重视对《易》的研究。《易》富于哲理性,他通过对《易》的解说,阐述对宇宙和人生的见解,积极发挥《四书》义理,并融合佛、道,将儒家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载与洛学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等人曾有过密切的学术交往,彼此或多或少在学术思想上相互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张载来到京师汴京,讲授《易》学,曾与程颢一起终日切磋学术,探讨学问(参见《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张载是二程之父程珦的表弟,为二程表叔,二程对张载的人品和学术非常敬重。通过与二程的切磋与交流,张载对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充满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因为张载与程颢、程颐之间为亲属关系,在学术上有密切的交往,关学后传不拘门户,如吕氏三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薛昌朝以及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在张载去世后一些人投到二程门下,继续研究学术,也因此关学的学术地位在学术史上常常有意无意地受到贬低甚至质疑(包括程门弟子的贬低和质疑)。事实上,在理学发展史上,张载以其关学卓然成家,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理论建树,这是不能否定的。反过来,张载的一些观点和思想也影响了二程的思想体系,对后来的程朱学说及闽学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张载依据《易》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在基本点上和《易》的原有内

容并不完全相同。他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认为没有超越“气”之上的“太极”或“理”世界,换言之,“气”不是被人创造出的产物。又由此推论出天下万物由“气”聚而成;物毁气散,复归于虚空(或“太虚”)。在气聚、气散即物成物毁的运行过程中,才显示出事物的条理性。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卷一)他用这个观点去看万物的成毁。这些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

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人是天地间藐小的一物。天、地、人三者共处于宇宙之中。由于三者都是气聚之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所以人类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归根到底,万物与人类的本性是一致的。进而认为,人们“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里所表述的是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境界。

二程思想与张载有别,他们通过对张载气本论的取舍和改造,又吸收佛教的有关思想,建构了“万理归于一理”的理论体系。在人性论方面,二程在张载人性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孟子的性善论。二程赞同张载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但二程认为“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瑕的;“气质之性”是气化而生的,也叫“才”,它由气禀决定,禀清气则为善,禀浊气则为恶,正因为气质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气”的侵蚀而出现“气之偏”,因而具有恶的因素。在二程看来,善与恶的对立,实际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

朱熹将张载气本论进行改造,把有关“气”的学说纳入他的天理论体系中。朱熹接受“气”生万物的思想,但与张载的气本论不同,朱熹不再将“理”看成是“气”的属性,而是“气”的本原。天理与万事万物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朱熹关于“理一分殊”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又说:“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朱子语类》卷九四)“理一分殊”理论包括一理摄万理与万理归一理两个方面,这与张载思想有别。

总之,宋明理学反映出儒、道、释三者融合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这一思想的融合完成于两宋时期。张载开创的关学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正如清初思想家王船山所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船山之学继承发扬了张载学说,又有新的创造。

三、关学的特色

关学既有深邃的理论,又重视实用。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风笃实,注重践履。黄宗羲指出:“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明儒学案·师说》)躬行礼教,学风朴质是关学的显著特征。受张载的影响,其弟子蓝田“三吕”也“务为实践之学,取古礼,绎其义,陈其数,而力行之”(《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特别是吕大临。明代吕柟其行亦“一准之以礼”(《关学编》)。即使清代的关学学者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依然守礼不辍。

其次,崇尚气节,敦善厚行。关学学者大都注意砥砺操行,敦厚士风,具有不阿权贵、不苟于世的特点。张载曾两次被荐入京,但当发现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毅然辞官,回归乡里,教授弟子。明代杨爵、吕柟、冯从吾等均敢于仗义执言,即使触犯龙颜,被判入狱,依旧不改初衷,体现了大义凛然的独立人格和卓异的精神风貌。清代关学大儒李颀,在皇权面前铮铮铁骨,操志高洁。这些关学学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体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

最后,求真求实,开放会通。关学学者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较宽广的学术胸怀。张载善于吸收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儒学理论。他注意对物理、气象、生物等自然现象做客观的观察和合理的解释,具有科学精神。后世关学学者韩邦奇、王徵等都重视自然科学。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王恕以治易入仕,晚年精研儒家经典,强调用心求学,求其“放心”,用心考证,求疏通之解,形成了有独立主见的治国理政观念。关学学者坚持传统,但并不拘泥传统,能够因时而化,不断地融合会通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由张载到“三吕”、吕柟、冯从吾、李颀等,这种融会贯通的学术精神得到不断承传和弘扬。

四、《关学文库》的整体构成

关学文献遗存丰厚,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泾野先生五经说》《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收入《四库全书》之外,大量的著作仍散存于陕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或民间,其中有的在大陆已成孤本(如韩邦奇的《禹贡详略》、李因笃的《受祺堂文集》家藏抄本),有的已残缺不全(如《南大吉集》收入的《瑞泉集》残本,现重庆图书馆存有原书,国家图书馆仅存胶片;收入的南大吉诗文,搜自西北大学图书馆藏《周雅续》)。即使晚近的刘光蕡、牛兆濂等人的著述,其流传亦稀世罕见。民国时期曾有宋联奎主持编纂《关中丛书》(邵力子题书名),但该丛书所收书籍涉及关中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内容驳杂,基本上不能算是关学学术视野的文献整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将《张载集》《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关学编(附续编)》《泾野子内篇》《二曲集》等收入《理学丛书》陆续出版,这些仅是关学文献的很少一部分。全方位系统梳理关学学术文献仍系空白。

关学典籍的收集与整理,是关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整理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关学研究的深入和关学精神的弘扬,影响到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掘。

现在将要出版的《关学文库》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共40种,47册,约2300余万字。

一是文献整理类,即对关学史上重要文献进行搜集、抢救和整理(标点、校勘),其中涉及关学重要学人29人,编订文献26部。这些文献分别是:《张子全书》《蓝田吕氏集》《李复集》《元代关学三家集》《王恕集》《薛敬之张舜典集》《马理集》《吕柟集·泾野经学文集》《吕柟集·泾野子内篇》《吕柟集·泾野先生文集》《韩邦奇集》《南大吉集》《杨爵集》《冯从吾集》《王徵集》《王建常集》《王弘撰集》《李颀集》《李柏集》《李因笃集》《王心敬集》《李元春集》《贺瑞麟集》《刘光蕡集》《牛兆濂集》以及《关学史文献辑校》。

二是学术研究类,其中一些以“评传”或年谱的形式,对关学重要学人进行个案研究,主要涉及眉县张载、蓝田吕大临、高陵吕柟、长安冯从吾、朝邑韩邦奇、周至李颀、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户县王心敬、咸阳刘光蕡等学人,共11部。它们分别是:《张载思想研究》《张载年谱》《吕大临评传》《吕柟评传》

《韩邦奇评传》《冯从吾评传》《李颀评传》《李柏评传》《李因笃评传》《王心敬评传》《刘光蕡评传》等。此外,针对关学的主要理论问题与思想学术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共3部。这些著作分别是:《关学精神论》《关学思想史》《关学学术编年》等。

在这两部分内容中,文献整理是文库的重点内容和主体部分。

《关学文库》系“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文库的组织、编辑、审定和出版工作在组织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和西北大学出版社负责。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对这一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国家和省级重大文化精品图书高度重视,亲自担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自始至终关心支持文库的编撰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江泽林,副省长王莉霞和省政府秘书长陈国强等对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给予悉心指导;原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薛保勤,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赵馥洁,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主任张祖培对文库的策划与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库历时五年编撰完成,凝结着全体参与者的智慧和心血。总主编刘学智、方光华教授,项目总负责徐晔、马来同志统筹全书,精心组织,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郑州大学等十余所院校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协力攻关,精益求精,体现出深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责任感;他们孜孜矻矻,持之以恒,任劳任怨,乐于奉献,以古人为己之学相互勉励,在整理研究古代文献的同时,不断锤炼学识,砥砺德行,努力追求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学术品格。出版社组织专业编辑、外审专家通力合作,希望尽最大可能提高该文库的学术品质。作为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我谨向大家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紧迫、经验不足等原因,文库书稿中的疏漏差错难以完全避免。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使用时加以批评指正,以便日后进一步修订,努力使该文库更加完善。

张岂之

2015年1月8日

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前言

编年是学术研究中经常采用的体例范式,不仅适用于历史上具体学人的个案研究,也适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学术思潮的系统考察。据我们的视野所及,目前已问世的学术史编年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近年陈祖武、朱彤窗的《乾嘉学术编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以及叶志衡的《战国学术文化编年》等。而以地域性学派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编年,尚不多见。因此,本书的撰写应该说带有一定的尝试性。

一般而言,学术编年往往以广博著称,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不仅是对学术思想史上有关学人的生平、学术事件、重要著作等内容研究与梳理,而且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众多学术领域。因此,需要立足于整体性、综合性的视域,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梳理思想学脉,精选出重要学术人物、重要学术事件;并对各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重要学者的著述与思想做出较为客观的评判。故学术编年具备以年代为经,以学术思想史的具体内涵为纬的典型特征:既能微观地反映学者们的生平学术活动及其思想特征、理论著述,也能宏观地呈现学术思潮发展的脉络;既能横向反映某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状况,也能纵向比较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为读者指示通衢。基于此,本书旨在通过对关学文献的整理,精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重要事件、重要著述,并尝试对关学学术思想的嬗变轨迹做出较为系统的揭示。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就我们目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而言,深感力不从心。所幸的是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等著作,在体例和方法上给我们提供了启示与借鉴;刘学智先生从资料的搜集整理、立目的取舍原则乃至具体的学术思想解读等方面给予我们热情的指导和帮助,使我们有信心去尝试它。

一、“关学”概念的界定及其下限问题

本书的编年立目,尤其是对人物的选择,乃基于我们对于“关学”的理解。张载(1020-1077或1078,字子厚)是北宋时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陕西宝鸡眉县横渠镇度过的,世称“横渠先生”。由于他长期在陕西关中讲学,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学术旨趣和风格的思想流派——关学。

“关学”得名于张载歿后。南宋吕本中云:“关学未兴,申颜先生盖亦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之俦,未几而张氏兄弟(张载、张戢)大之。”^①刘子卿云:“横渠先生倡道关中,世谓之关学。”^②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又将张载与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并列考察。明代冯从吾著《关学编》,其《自序》云:“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眉邑,倡明斯学,皋比勇撤,圣道中天”,“一时学者歆然向风,而关中之学益大显明于天下。”^③其友张舜典在《关学编·后序》中云:“夫天覆地载,日日月临,凡有血气,莫不有性命,而道在焉。道在而由之、知之,则学在也。奚独以‘关学’名也?《关学之编》,少墟冯侍御为吾乡之理学作也。”又云:“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炳炳尔也;不论升沉,不计崇卑,而学洙泗、祖羲文者,无不载焉。”^④可见,冯氏是以“关中之学”明论“关学”,所指乃为“关中理学”。作为其莫逆之交的张舜典更明确指出是为“理学作也”,“独载理学诸先生”。继后,清代全祖望再次使用“关学”这一概念,云:“关学之盛,不下洛学。”^⑤全氏这种论述,也是来源于南宋以来“濂洛关闽”并列言说的传统,把关学视为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后世王心敬、李元春所著《关学续编》、张骥所著《关学宗传》也基本延续以上宗旨来选录学人^⑥。换句话说,即认为“关学有编”。诸如王心敬在《关

①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61页。

② [清]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374页。

③ [明]冯从吾撰:《关学编(附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页。

④ [明]冯从吾撰:《关学编(附续编)》,62页。引用时个别标点作了改动。

⑤ [清]黄宗羲着:《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094页。

⑥ 张骥《关学宗传》收录人物标准更广,“独行”、“文词”,“气节”、“隐逸”、“名臣”、“吏行”等也均载。

学续编·序》中云：“关学有编，创自前代冯少墟先生。其编虽首冠孔门四子，实始宋之横渠，终明之秦关（王之士，1528-1590，号秦关），皆关中产也。”^①张骥《关学宗传·自序》亦云：“昔横渠氏关中崛起，开门授徒，分濂洛之席，绍邹鲁之传，一时蓝田、华阴、武功诸儒阐扬师旨，道学风行，学者称初祖焉。俄而，北都沦陷，完颜代兴，奉元一派不绝如缕，几同闰位。迨石渠公（王恕，1416-1508，号介庵，晚又号石渠）唱道三原，康僖（王承裕，1465-1538，字天字，谥康僖）纘承家学，学风不变。而渭南南氏（南大吉，1487-1541，字元善）兄弟以姚江高弟开讲渚西，稍稍乎门户分矣。冯侍御（冯从吾，1557-1627，字仲好，以侍御告归）予告还乡，提倡绝学，可谓中兴。而再传之后，寢以不振。李二曲以坚苦卓绝之身，肩程朱陆王之统，至精至粹，无党无偏，卒以非笑者多转为吾道通行之障。迄于李桐阁（李元春，1769-1854，字仲育，人称桐阁先生）以贤圣自期，尊崇正学，而省斋、清麓亲业其门。沔西（柏景伟，1831-1891，号沔西）、古愚（刘光蕡，1843-1903，号古愚）闻风而起，至今日而有坠绪之可寻，遗文之足录者，皆数君子之力也。”^②可见，王氏、张氏均从重要传承人物及其贡献方面对“关学有编”作了概述，其论亦推进了关学史研究的进程。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关于“关学”的界定及其学派的下限问题一直存在着分歧，主要观点有三：其一，继承传统的说法，以“关学”为“关中理学”，代表人物为侯外庐、陈俊民、龚杰等，但是在下限的断定上诸家又存在分歧。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册上）认为关学是北宋时期“以张载为核心”的一个“陕西地方学派”。并吸收黄宗羲之论，认为：张载“倡道于关中”，虽然“寥寥无有和者”，但缘于吕大钧“执弟子礼”，此后“学者靡然知所趋向”，于是关学学派得以形成，“北宋亡后，关学就渐归熄灭”^③，“关学没有渊源，张载也无师承”^④。可见，侯氏虽不赞成关学为洛学的一个分支，但事实上也承认了它的理学特质和地域特色；并指出关学史仅限于北宋，并无传承。陈俊民则认为：“关学不是历史上一般的‘关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

① [明]冯从吾撰：《关学编（附续编）》，65页。

② 张骥：《关学宗传》，陕西教育图书社，1921年排印本。

③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545页。

④ 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93页。

代关中的理学。”^①陈氏这一说法基本解决了关学与关中之学、关学与理学的关系。同时,陈氏明确反对把关学限定于北宋,一方面,陈氏吸收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的说法,认为关中的“申(颜)侯(可)二子复兴儒学,实开‘关学之先’”,“张载理学,既无直接师承,也无间接私淑,只是在范仲淹的导掖下,主要通过对儒学的‘苦心力索’,独立创造的”,“当然,丝毫没有任何师承和渊源的学派也是没有的。据《宋史·孝义传》和《宋元学案》所载,庆历之际的侯可,很可能是张载的师承”。另一方面,认为北宋之后,关学虽然“衰落”了,但是并未“熄灭”,“而是出现了两种倾向,即‘三吕’的关学‘洛学化’和李复的关学‘正传’发展”。在明代,又涌现吕柟、马理、韩邦奇、冯从吾等学者,关学曾出现中兴的趋势。至清初,“李颀用‘儒学’代替‘理学’,致使关学‘复盛’而终”。^②据此,在陈氏看来,关学史的潜在上限为申、侯二人,下限应为明末清初的李颀。龚杰认为:“所谓关学,就是指由北宋张载创建的一个理学派别。”^③龚氏也肯定了关学与理学的关联,并指出“据明冯从吾《关学编》,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的《横渠学案》《吕范诸儒学案》,清张骥《关学宗传》等书的记载,可考见的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游师雄、薛昌朝等,受学于张载的有种师道、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曾学于张载并传播其学的外地学者有晁说之、蔡发等,其中,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④但是,作为侯外庐学派的继承者,龚杰不认同“关中理学”的说法,认为它“把关学的范围加以扩大”,而宋代以后的关中理学家“不是关学的续传”,关学“上无师承,下无继传,南宋初年即告终结。”^⑤

其二,认为“关学”有两层含义,以张岱年、赵吉惠为代表。张岱年认为:“一指张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二指关中地区的学术思想。”^⑥赵吉惠进一步明确指出“关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认为:“‘关学’概念在历史上向来有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理解与用法。广义的关学,泛指封建社会后期的陕西关中

① 陈俊民:《关学源流辨析》,载《中国哲学》第9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② 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0-48页。

③ 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06页。

④ 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8页。

⑤ 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06-207页。

⑥ 张岱年:《〈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序言》,见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5页。

理学(儒学)”,而“狭义关学特指北宋时期以陕西关中张载为创始的理学或张载关学学派。”^①赵氏实际上将上述观点加以综合,前说(广义说)认同了陈俊民的说法,后说(狭义说)认同了侯外庐的说法。前说把关学的外延加以扩展,后说又把关学有史加以否定。

其三,认为关学是“张载及与张载学脉相通之关中理学”,此说以刘学智为代表。认为“只要学术思想、学风相通、相合、相类或因其某一地域、某一时代所限者,皆可谓同一学派,其可以直接相承相继,亦可间接沿袭、传续,不一定非有师承门户不可。”并说:“孟子、荀子、董子等儒学,多能随时代之变化或改变或发展,皆未能做到恪守孔子儒学‘原旨’不变,也未有直接师承,由此看来,谓关学至南宋而‘终结’,恐未安。”^②又说:“以此为原则和方法,对冯从吾、王心敬、张骥等所撰相关关学史著作中提及的关中理学家进行必要而严格的筛选,也许对澄清关学源流、彰明关学思想特征有明确标识性意义。”^③可见,上述界定标准是以学理特征为依据,注重从学术思想、学风继承方面梳理关学学脉,这在众说中突显独特的创见性。然而,这种以张载学脉、学风为标准的筛选原则,虽然对推进“关学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以此为标准对关学学者的梳理与把握具有较大的难度。

此外,关于下限问题,武占江提出了关学至清末刘光蕡终结的观点。他说:“关学是由张载开创的关中理学。它经历了宋代奠基、元明维持、明清之际拓展直到清末结束三个阶段”,“李二曲将关学发展到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新时期。刘古愚在实学精神的推动之下,积极研究,宣传新学,从而结束了关学。”^④武氏之说以刘光蕡之学的近代转型为判断标准,对关学史上限的探索有重要作用。但是,该说法又忽略了具有浓厚理学思想,且活跃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以张元际、张元勋、牛兆濂及其弟子李铭诚等为典型代表。

综观以上诸说,均承认张载创立了关学,关学是理学的流派之一,但在关学史的下限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或以为关学终于北宋,或以为下限至明末

① 赵吉惠:《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41-242页。

② 刘学智:《儒道哲学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280-281页。

③ 刘学智:《关学及二十世纪大陆关学研究的辨析与前瞻》,《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4期。

④ 赵吉惠、赵馥洁主编:《张载关学与实学》,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431页。